

GAO YI HAN

高一涵

WU SI SHI QI DE ZHENG ZHI SI XIANG YAN JIU

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

- 从《甲寅》到《民彝》期间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新青年》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每周评论》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努力周报》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现代评论》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吴汉全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GAO YI HAN WU SI SHI QI DE ZHENG ZHI SI XIANG YAN JIU

高一涵 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

吴汉全●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 / 吴汉全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06-08179-8

I. ① 高…

II. ① 吴…

III. ① 高一涵(1885~1968)—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1512号

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

著 者: 吴汉全 封面设计: 孙浩瀚

责任编辑: 陈亚南 责任校对: 桑一平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吉林省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92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8179-8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高一涵是一位值得研究的重要历史人物。开展高一涵的研究工作，对于深化五四时期这段历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有学术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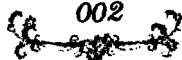
高一涵（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别名涵庐、梦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读书好学，13岁能作诗文。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高一涵毕业回国，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兼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高一涵赴武昌途中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四一二”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高一涵脱离了共产党，避居上海，任法政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和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学院院长。1932年9月，高一涵、杭立武等45位政治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政治学会。1931年至1949年，高一涵先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南京市监察委员、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0年高一涵经周新民、陈敏之介绍加入中



国民主同盟，任民盟江苏省副主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8年4月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等著述^①。

现有学术著述，在谈到五四时期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段历史时，尚未见到有人将高一涵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笔者注意到，高一涵在《太平洋》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5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文章，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就有重要的贡献。在宣传十月革命方面，该文对于国内有人把“布尔扎维主义”说成是“过激主义”、把主张“布尔扎维主义”的人说成是“过激派”，进而以“洪水猛兽”视之而“格杀勿论”的反动言论，予以猛烈的抨击。该文介绍了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组织，认为“俄国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绝不是无治主义的国家”，俄国这种“政府的组织，是拿马克思主义（Marxism）做底稿子”的。文章指出：“俄国最高的政权都在劳兵农会议手里；这个劳兵农会议，是全俄都市会议和各地方会议的代表组织成功的。都市会议每两万五千选民选出一个代表，各地方会议每十二万五千选民选出一个代表。可见得劳兵农会议是人民公举的代表，是一种合议体的机关，说是平民合议制则可，断不能说是平民独裁制的。这个会议，一年至少开会两次，全由俄中央行政委员会召集；闭会的时候，中央最高的政权放在全俄中央行政委员会手里，这种委员会差不多有二百位会员，分部办事，又怎么说是独裁呢？……就是说俄国劳兵农会议单限于劳兵农三项人，然这是

^① 据 <http://baike.baidu.com/view/717299.htm>



普通阶级，是有职业的阶级，在国内占最大多数；联合这种多数人组织会议制的政府，彻头彻尾是一个共和政体，绝不是一个什么独裁政权。”该文认为俄国的土地政策在思想上也是渊源于马克思的，是“拿马克思的学说来实地试验”，也就是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文章指出：“俄国的政治组织是很平易的，一点儿稀奇也没有；所以骇人听闻的，只是实行土地产业国有的一件事。究竟这件事，七八十年前的马克思已经说过多少遍，俄国现在不过拿马克思的学说来实地试验罢了，那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值得大惊小怪呢？”该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并对于《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马克思把人类的历史，看做阶级争斗的影子。先前的历史都是有势力的人、有钱财的人欺压没有势力、没有钱财的人的历史；所以他主张社会革命，想叫穷人出来当权。他在七十七年前，已经发了一个《共产派的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宣言书之条件，很可以代表马克思生平的主张。在马克思前的社会党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思才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和安格尔斯（Engels）两个人用 Communist 一个字标明他们和空想派不同，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又可以叫做共产主义（Communism）。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目的，在宣言书中说明的：是把穷人合成一个团体，叫他们取到政权，把中等人家的私有财产权一齐废掉，请劳动的人出来代替资本家。他们实行这种理想的方法，就是把私有的资本一齐收归公有，把中等人的自由经商，中等人的家族，中等人的宗教道德，和国际间的仇恨，一齐废掉；他们达到这种方法的目的，仍然依靠政治行动。宣言书中替穷人要求的条件共计十种：（一）地租充公，（二）行累进直接税，（三）废去承继家产权，（四）把出国居住的人的财



产充公，（五）拿公款来办国家银行，把信用归总起来，（六）把运送的收归公有，（七）工场由国家去设，土地让国家去耕，（八）强迫工人做工，（九）渐渐废去城国的界限，好叫生产的分配平均，（十）拿自由公共的教育教导所有儿童。——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书中的大意。”^① 这里，除了有些译文不够准确外，大体上介绍出《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这里详加引述高一涵的这篇文章，就是想提请学术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五四时期，高一涵对于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功绩的。

总的来看，学术界对五四时期历史的研究颇为深入，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亦取得大量的成果，但对高一涵的研究却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五四时期高一涵的形象。既有的研究虽然注意到高一涵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但未能注意到高一涵从《新青年》，经由《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再到《现代评论》期间，思想过渡的情形及其思想重点的变化；同时，既存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作为思想家的高一涵，很少看到作为学者的高一涵的一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每周评论》的创办则是《新青年》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周报》和《现代评论》这两个刊物，按照胡适的说法是继续《新青年》的启蒙事业。本书在回顾高一涵在《甲寅》月刊、《民彝》杂志期间的思想后，主要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为考察线索，对高一涵在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进行分阶段的梳理，使高一涵在整个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有一个基本的概貌，

^① 高一涵：《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太平洋》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5日。



大致显现出高一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形象^①。

本书之所以重点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这四个刊物为线索、按阶段来研究高一涵的政治思想，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这四个刊物确实反映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变迁的轨迹，具有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可以作为五四时期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线索。二是这四个刊物所关注的重点又有所不同，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新青年》侧重于思想启蒙，特别重视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每周评论》尤为关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政治斗争的色彩特别浓厚；《努力周报》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后，自由主义者集结起来的一次重大努力，而且也很关切国内政治建设，努力介入中国的思想舆论界；《现代评论》在当时是北方自由主义学人的大本营，亦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以议政方式而参与现实政治的一次不成功的实践。由于这四个刊物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需要分开来进行研究。这样既能体现五四思想的阶段性，又能凸现高一涵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面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① 自然，高一涵在五四时期还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过《忠告国民进步两系》、《调和之私解》等文章。据大致统计，高一涵在《甲寅日刊》上所撰写的文章，属于社论（或论说）的有23篇，属于时评的有7篇。研究高一涵在《甲寅日刊》的文章，对于进一步深化研究高一涵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也有重要的意义。提示出这个问题，是期待学界对此能做出具体的研究。

目 录

前 言 / 001

导 论 / 001

一、高一涵研究的基本现状 / 001

二、高一涵研究应着力开展的重要领域 / 007

三、进一步深化高一涵研究的努力方向 / 024

第一章 从《甲寅》到《民彝》期间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001

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 002

二、宣传“主权在民”的国家观 / 008

三、阐发政治调和的思想 / 013

第二章 《新青年》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020

一、以青年为启蒙重点，塑造青年的新形象 / 021

二、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积极倡导思想革命 / 027

三、输入西方自由学说，宣传现代国家理论 / 036

四、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开创者 / 056

第三章 《每周评论》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076

一、主张拒绝和约签字，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 077



二、揭露黑暗政治现实，抨击国内军阀政治 / 084

三、关注世界发展大势，追寻民主政治理想 / 091

第四章 《努力周报》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096

一、倡导联邦分权制，反对集权制体制 / 096

二、抨击军阀的黑暗统治，揭露军阀政治的实质 / 102

三、主张政治的根本变革，探求政治改革的新路 / 106

第五章 《现代评论》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 114

一、对段祺瑞政府的猛烈批判 / 115

二、揭露张作霖“军治”的反动性 / 126

三、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新探索 / 132

结 语 / 144

附录 1：高一涵留学日本时期的交往活动及其影响 / 154

附录 2：高一涵 1920 年春重返日本有关事实的考察 / 167

附录 3：高一涵与《努力周报》的编务工作 / 177

附录 4：高一涵五四时期主要著述（论文类）目录 / 191

后 记 / 211

第一章 从《甲寅》到《民彝》

期间高一涵的政治思想

考察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演变与发展，需要首先研究高一涵从《甲寅》月刊到《民彝》期间思想的状况。《甲寅》月刊创办于1914年5月，《民彝》杂志创办于1916年5月。这两个杂志都是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前者的创办者是章士钊，后者的创办者是李大钊、高一涵等。高一涵在这两个杂志都发表了具有相当分量的文章，积极关注民国后政治建设的进展，阐发了自己基本的政治理念。也就是在《甲寅》月刊和《民彝》杂志这两个杂志中间的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将原来曾在《甲寅》月刊发表文章的一些人如高一涵、李大钊、胡适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高举思想革命、文化启蒙的旗帜，从而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正式兴起。因此，研究《新青年》杂志，需要研究《甲寅》月刊这一个渊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留学日本的高一涵、李大钊等，于1916年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民彝》杂志，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与国内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深刻反思民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积极反对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民彝》杂志的这种思想理念，因为在作者群上与《新青年》具有大致同一的关系，也就自然地影响着刚刚创办的《新青年》。由此，研究《新青年》杂志，也需要研究《民彝》杂志所给予的影响。

从《甲寅》月刊到《民彝》杂志期间，高一涵的政治思想有



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

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民国建立以后，高一涵积极地阐发共和制度，是共和制度的坚决拥护者。高一涵以共和的信念看待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他对于袁世凯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据高一涵本人回忆：“因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订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斗争，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订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留日学生总会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民彝》，守常任主编。我们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①总的来看，在袁世凯窃取政权前后，高一涵积极宣传共和制度，对于袁世凯的政策多有批评。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高一涵则鲜明地举起反袁旗帜，揭露袁氏的反动面目。

民国初年，高一涵积极倡导共和制度，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实行共和制度的必然性。袁世凯窃取政权后，社会上有人以中国“广土众民”为借口，认为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为复辟帝制张目。在高一涵看来，对于共和是否适合中国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共和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在高一涵看来，共和制度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近世政治之精神，不在人人得以直接议制执政，在多数者享有选举权，得以间接行之耳。故代表制之日行而有效，实为近世共和民政所以成功之真因。”这就是说，现代民主政治在于其采行“代表制”，而共和制度正合于代表制。由此，

^①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

“代表制”并不以“大国小国人众人寡”为限，“今谓吾华为广土众民之国，不适共和，即无异谓广土众民之国，不适于代表制度”^①。当时，社会上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共和国家，易酿兵争元首之祸”。对此，高一涵予以严正地驳斥。高一涵指出，这种以“兵争元首之罪”归咎于“共和”，“骤闻之似觉动听，殊不知共和者国家之制度，争元首者出于桀骜者之野心”。如果“以执行此制之不善而移罪于共和本身”，那就是“李代桃僵，诟为平情之论”^②。当时社会上还有一种议论，即认为施行共和制度必须使民众达到一定的程度，中国人因为“程度不足”，所以不能推行共和制度。对此，高一涵就“程度”予以学理的辨析，认为所谓“程度”只是相对的，而且以“程度”立论也不符合对国家问题的正确分析。他指出：“程度云者，乃比较上相对之称，若无绝对之界限可立。设豫悬一定之的以寻求，谓及乎此者，方可共和，否则仍宜专制，是视国家如筑室造路，可准绳尺以求，嗟咄立办，而忘其为有机体之发展，为心理之构形也。”^③在高一涵看来，中国人的“程度”确实不高，“平情论之，谓程度低下为食数千年专制流毒之报，无问何人，不能否认”；也正因为国人程度不高，遵循“民众本位”原则，所以要实行民主政治、推行共和制度。高一涵指出：“今欲救程度低下之弊，舍力行平民政治，更有何法？若曰政治自政治，程度自程度，必待程度已足，吾之专制方可取消，民政方可施用，然则国家职务，其将置人民于度外，听其自进自退乎？抑将培养熏陶，令其蒸蒸日上，循轨前趋乎？改进程度之法，其将以专制为本，绝其经验之途为善乎？抑以民政为本，令其自行试验为善乎？欲明前问，必先明国

① 一涵：《共和》，《民彝杂志》第1卷第1号，1916年5月15日。

② 一涵：《共和》，《民彝杂志》第1卷第1号，1916年5月15日。

③ 一涵：《程度与民政》，《民彝杂志》第1卷第1号，1916年5月15日。



家之职务；欲明后问，必先论专制民政之孰优。”^① 高一涵的看法是，共和制度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是在与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正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专制主义政治统治，因而“因病施药，易以共和，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者”^②；“欲救程度低下之病，惟民政为最有效”。因此，“果见吾国大患，确在程度不足，正应药之以共和，补之以民政”^③。

高一涵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演变，注意分析袁世凯政府的政策。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执行摧残国民党的政策。反清元老章太炎被囚，就是一个显例。1914年8月，高一涵致信《甲寅》月刊，在表彰章太炎业绩的同时，对“当道者”袁世凯予以猛烈的抨击，表示对章太炎被囚予以舆论上的声援。高一涵在信中写道：“记者足下，有友人自京师来，道及太炎先生近境，穷饿囚拘，间日一粥，婉转尘榻，形若槁木，直言之，曰无形残杀而已。……继隆古昔，黄巾犹拜郑公，阿瞞尚容名士。而亡清末季，文字祸兴，执先生于上海，海内激昂，犹得不死。今先生所履之罪，与击鼓厉骂者奚若？大总统之为人行事，与黄巾、阿瞞奚若？堂堂民国，与亡清又奚若？凡有血气，虽不敢宣之于口，类能识之于心！乃锄戮文豪，独见于盛世！余愚窃为盛世惜之！”^④ 高一涵在信中，通过将“民国”与“亡清”、“大总统”与历史上之“黄巾、阿瞞”相比较，说明“大总统之生杀可以好恶出之”的品行。使高一涵感到不解和愤懑的是，“在视革命若蛇蝎之满清时代，清议犹能生先生于狱中，谓当共和大成之秋，而不能救先生于龙泉寺”。这是对袁世凯的有力批判！在此信中，高一涵希望能够借助《甲寅》杂志“酿成舆论，得救先生，使当道者知人

① 一涵：《程度与民政》，《民彝杂志》第1卷第1号，1916年5月15日。

② 一涵：《共和》，《民彝杂志》第1卷第1号，1916年5月15日。

③ 一涵：《程度与民政》，《民彝杂志》第1卷第1号，1916年5月15日。

④ 高一涵：《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

心不死，公论终不能屈于权威之下也”^①

高一涵认为袁世凯当政后只是借“国利民福”相号召，实施其打击国民党人的目的，并未真正要实现“国利民福”。他指出：“民国成立，于今三载矣，国门布告，莫不以‘国利民福’为言，虽中经政变，法案全翻，而此‘国利民福’四言，持之益固。闻者疑吾言乎，则请检阅三年以来大总统之命令，各议会之咨文，阁员疆吏之宣告，与夫政客之所谈论，报社之所鼓吹，众口同声，几视为天经地义。今大总统以‘国利民福’自誓者也，故尊奉之；海外党人，指为反乎‘国利民福’者也，故放逐之。”又指出：“三年以来，政府非日以谋中央集权为事乎，乃所谓中央集权界说，竟与政府万能主义同途。国会解散，代行立法机关者，全以任命议员，则没收人民选举权矣。日增国债，不谋于担负之人，商办之业，任意盗抵，则代理人民财产权矣。指奸则奸，诬匪则匪，杀人不询其供，拘人不谋于法，则蔑视人民生命权矣。毁党而任私派，则人民评政之自由权失；返国者须携护照，则人民行动于本国之自由权又失。犹虑或谈政于野也，为密布爪牙鹰犬之间谍以伺之；虑四百兆人民之不能尽臣妾也，为四纵代表国家战斗力之军队以淫之。”^② 高一涵认为，在袁世凯的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以国家的力量“代行人民权利”，将民众作为“疾废”、“童稚”、“皂隶”来对待，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还美其名曰“民福”。高一涵写道：“今之政术，固明明疾废我，童稚我，抑皂隶我矣，犹给曰民福。里中村姬，见垂暮高年，龙钟衰朽，孙曾绕膝，饥寒则为之衣食，起坐则为之扶持，生养无能，守之待毙，反而艳羡赞曰‘福星’。今之民福，其有异此村姬所赞者乎！”^③ 高一涵的结论是，当时政府就是“侵夺人民一

① 高一涵：《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

② 高一涵：《民福》，《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③ 高一涵：《民福》，《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切公私权利，集收于政府之下，听其恣意执行”，民国的政治也成为“官僚之事业，与人民无关者也”；由此，民众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不得与闻政治，“尔人民除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外，绝无他职；如敢与人家国事，则匪而已矣”^①。

袁世凯称帝后，高一涵著文指出袁氏已经是国家的叛逆，要求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不得与其“调和”。袁世凯攫取大总统职位后，公然称帝，遭到国人舆论的猛烈声讨。可在当时，居然有人发表文章，声称应该寻求政治的途径与袁世凯进行“调和”，迫使袁氏取消帝制；与此同时，也有人主张通过舆论途径，逼迫袁世凯放弃大总统的职位。高一涵认为，民国是共和国体，袁世凯既然宣布复辟帝制，那就已经成为国家的叛逆，因而不得与其调和。他指出：“今袁氏自承认帝制之日，即为失去总统资格之时，故今日之袁，在法仅得谓之叛逆。犹曰‘与某调和’、‘迫某退位’。党派之间，可言调和；正逆之间，则绝无调和之余地。彼犹有总统资格，可言退位；今资格已失，位亦消去，何得言退？”^② 高一涵反对袁氏复辟帝制的信念是坚定的，其反袁言论是当时反袁舆论中的重要代表，对于人们认清袁氏的真面目有着积极的意义。

高一涵在《甲寅》月刊上发表文章，在从学理上辨析“宗教”问题的过程中，对当时社会上的尊孔言论予以猛烈的批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行文化专制主义，一时间封建思想沉滓泛起，更有甚者，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之中。由此，出现了不少倡导孔教的文章，其总的观点是“宗教为人类所必不可无”。鉴于此，高一涵在《甲寅》月刊上发表《宗教问题》的文章，着重论证“人类应

① 高一涵：《民福》，《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② 一涵：《国本》，《民彝杂志》第1卷第1号，1916年5月15日。

否终有宗教问题”，希望人们能够树立科学的宗教观，不要为狂热的迷信思想所蒙蔽。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将与人类相终始，其理由是：“宗教本随时之义而成，与天地相始终，太古民智单弱，见异而惊，故宗教之事起。人智弥进，推知弥远，远则不思议之境弥多，故宗教之义，日离迹而即于玄，其论愈幽，其行愈远。”高一涵不同意这种看法，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学理的批判。在他看来，“论事在求其征，说理贵推其故”，“其理玄奥难知”不得“委为天功”，“其道怀疑不明”不得“归诸神秘”。这是因为，“宇宙既形此显象，悬示吾人之前，断非徒有象而无理，事有象而理难征者，乃吾知之有涯，不得谓彼为神秘”^①。高一涵从学理上说明，将宗教说成是人类本性的言论，有悖于人类认识的进程，不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他指出：“昔者地雷风火，举拜为神，今虽四者真因，仍不可得，即象推寻，归诸物理，不谓设于神意。此理固甚明矣。夫信之对为疑，祛疑为信，不闻怀疑为信；诚之训为不欺，自欺为妄，不闻自欺为诚。今指不可知者为神造，在学理上不得不以为疑。守不能明者为天真，在人道不得不以为妄。……所求者在通，以其玄奥难知，则通之途已塞；认不通为通，则通之本已误。所求者在安，以怀疑不明，则安之念已摇；强不安为安，则安之本奚着？余愚窃以为不明则不通，不诚则不安。假不明者以为明，定不安者以为安，则邻于妄且欺。人道期于征实，谓此既妄且欺之行为，必于人道相终始，天地无终极，而此行为亦随之无终极，若佛家所谓真如无名，终古并存者然，犹诏人曰，此信也，诚也，说将何以自圆？”^② 高一涵的论述说明，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断进步的，不能将不明之事归诸于神秘，更不能以此作为人类离不开宗教的

① 高一涵：《宗教问题》，《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② 高一涵：《宗教问题》，《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